



陽泉文史資料

第一輯

井內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阳泉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阳 泉 文 史 资 料

第 一 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阳泉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1984年9月

编 辑 凡 例

一、本刊出版的目的在于抢救、保存和积累历史资料，为有关部门研究历史及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教育提供素材。欢迎各界人士积极提供资料。

二、本刊选载之资料，大都是撰写者的亲历和见闻。但由于每个人都有一定的局限性，故难免有不尽翔实之处，欢迎读者阅后提出补充和订正。

三、本刊对来稿可以选录、删节和做文字上的修改。

目 录

前 言

阳泉历史沿革·····	杨子仪 (1)
解放前的三大煤炭公司·····	商子和 (5)
山西争矿运动始末·····	姚富祥 (11)
百团大战的中心	

——正太路战区纪实·····	李庆祥 (35)
海峡两岸敬仰的人物——窦瑛·····	岳怀平 于进江 (44)
窦大人故乡见闻·····	刘伯文 (48)
太行杀敌英雄赵亨德·····	王来金 (50)
赵亨德故事选·····	鲍春花 冀石钰 (53)
临潼捉蒋亲历记·····	陈一路 (79)
阿尔隆在阳泉的罪行·····	石 风 (90)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名单·····	(95)
《阳泉文史资料》征稿启事·····	(96)

后 记

前 言

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五周年的时候，《阳泉文史资料》创刊出版了！

《阳泉文史资料》是政协阳泉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辑出版的不定期的内部刊物。

阳泉是新兴的社会主义的工业城市，是无烟煤能源基地。它的发展在我国近、现代史上，是具有典型意义的。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 一个发展”，“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今天和明天是分不开的，只有了解昨天，才能更好地知道今天，只有知道昨天和今天，才能更清楚地看到明天。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和崇高美德，是推动祖国历史前进的一种巨大精神力量，是我们实现祖国大团结、大统一的思想基础。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进行对近代史、现代史资料的征集、研究、编辑、出版是我会的一项重要工作任务。

《阳泉文史资料》的出版，为在阳泉工作或在阳泉工作过的老年人士，撰写亲身经历的回忆资料等提供了园地。它既可以揭露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黑暗，也可以揭露各个不同时期各种反动人物的丑恶面目；既可以赞颂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爱国志士和英烈人物，也可以讴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革命斗争。是对年轻一代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

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的辅助读物；是向历史研究部门提供史料的参考丛书。它的出版对于进一步团结为数众多的、阅历丰富的老年人士，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使他们通过这种比较适宜的工作途径为社会主义事业做出新的贡献，必将发挥积极的作用。

《阳泉文史资料》要力争做到“生动、具体、翔实、感人”，除富有爱国主义、社会主义的教育意义外，还将具有长期的使用和保存价值。

《阳泉文史资料》第一辑虽然出版了，但由于我们水平有限，经验不足，缺点与不妥之处在所难免。希望读者看后，能提出宝贵的修正、补充和批评意见。

• 编者 •

解放前的三大煤炭公司

商子和

山西的煤炭开采权，在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就由清政府与英商福公司订立包办合同，出卖给外人，以六十年为期。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该公司因清政府租给法国修建的正太铁路已从石家庄修到阳泉，它就派人到太原不征求地方政府同意，擅自购买民地，封禁原有私营煤矿，遂激起了废约运动，不仅本省人民都积极参加这个废约运动，甚至当时在日本留学的晋籍学生，也奋起响应。阳高学生李培仁因痛心于争矿运动久无结果，竟在东京蹈海而死。这样就更激起了全省人们的决心，把废约运动推向高潮，全省各县人民很快就凑起银子二百七十五万两，从英国人手里赎回矿权，获得废约争矿的胜利。

矿权既已夺回，而正太路也已修到阳泉，省外人看到有利可图，都在招股筹资来阳泉开采煤矿，成立煤栈，铺设道岔，储存煤炭，准备在通车后运往娘子关外销售。当时在阳泉煤业公司中较大的首先是保晋公司，其次是广懋公司，建昌公司。它们从成立至抗战开始，一直存在了三十多年，现在就将这三家煤炭公司分别介绍如下：

保晋公司

筹建于光绪三十四年，成立于民国三年。每股股金白银五两，原计划筹五十万股，实筹到三十八万五千五百五十股，计白银一百九十二万七千七百五十两。其中村社股占百分之三十，私股占百分之七十。

保晋公司分为总公司，分公司。总公司原设在太原，后移至阳泉。分公司为大同分公司、石家庄分公司、泽州府分公司、保定分公司、北京分公司，其中除大同、泽州府是开采煤矿外，石家庄、保定、北京等三个分公司都是经销煤炭的。

保晋公司在阳泉经常开采着的煤矿有四处：

一矿：铁炉沟，矿长张一方。

二矿：燕子沟，矿长王 骧。

三矿：贾地沟，矿长史实如。

四矿：石卜咀，矿长张石生。

此外，在小阳泉村西简子沟和平潭壩村东口虽也开办过三个矿，但因被水淹没，中途停办。

上述保晋公司的四个煤矿中共有工人八百多人，每年产量，据有档案可考者而言，民国十四年为228,350吨，民国十五年为235,675吨，民国十六年为176,727吨，仅据此数据而言，有升有降，发展不平衡。但其每年产量却超过于广懋、建昌两家煤炭公司。

保晋总公司内设总理一人，第一任总理是渠本翘，山西祁县人。第二任总理是崔廷献，山西寿阳县人，第三任总理是常旭春，山西榆次人。还设有协理一人，第一任是白云轩，第二任是曾子纲。除总理，协理外还设有总稽核，第一

任是王骧，第二任是杨筱元。还设有秘书、矿师、机器师、会计、总务、矿警和事务人员，组织庞大，待遇较高（高的在二百元以上，低的也在四十元以上）饭食花样多，是那时阳泉第一流的饭菜。因此省里的文武官员到了阳泉，都下榻保晋公司，由保晋公司以上宾款待，甚至还供给鸦片烟吸。故保晋公司的日产和收入虽多，但开支也大，盈余不多，甚至没有盈余。自民国十三年以后，尤其是在民国二十五年、二十六年的外债逐年增加，就现存的债券而言，共计欠外债十六万元。

保晋公司，除产销煤炭外，还在桃河北岸银蹄壩下附设有熔化厂（即阳钢前身）内设有炼铁高炉、机修车间和发电车间、磁瓷车间，并设有高线车，运输铁板和煤炭。保晋之所以设立熔化厂主要是为四个煤矿服务。厂长是赵铁铮，留英学生，既懂得科技，又长于书法。

保晋公司所属各煤矿在吸水方面和从坑下向坑上起运煤炭方面都用的是机器。在四个矿中除石卜咀的第四矿仍雇用牲口向阳泉煤场驮运煤炭及贾地沟第三矿铺设轻便路，用人力往赛鱼车站运送煤炭外，一矿、二矿和总公司，都铺设道岔由火车向省外运销。

总之，保晋公司的资金雄厚，煤矿较多，设备机械化，产销额和收入额也都超过其他两家煤炭公司，但其它小煤窑、小煤栈每年都有盈余，而保晋公司不仅没有盈余，反而有亏损，欠外债。其原因就是：一、规模大，开支多，讲排场，闹阔气；二、经理协理等非生产人员每月的待遇竟超过矿工十几倍，待遇太悬殊；三、经理协理等都是些官僚、富翁、腐儒，他们只知道领高薪，吃肥鲜，吸鸦片，打麻将，对劳动人民的安全和生活福利都置之不理。矿工不愿为他们

卖命。在上述三个原因中，最后一项更为重要。

广懋公司

、成立于一九一一年，是武昌人周伯操集股办起的。周伯操是个实业家，曾在武昌办起汉阳铁厂，武昌纺织厂和鼎孚商行。

据广懋内部人说，他们的资金原为一百万元。后在民国三十三年又集了一次股，增加了四十万元。股东多是官僚富商。据说段芝贵就是其中的一个。它有矿四处，即柳沟、黄沙岩、石圪塆、鹊山，（在平定西关）其中以黄沙岩、石圪塆为主，共有工人六百多人，在坑下的多，在坑上的少，每日产煤炭两千吨，每个矿都设有矿长一人，管理矿上的事。总公司则设在阳泉车站的北头，内设总务、会计、营业、测绘等人员。经理住在里边，掌管公司里的事务。公司所在地铺设着道岔，矿上的煤炭雇用骡驮运到这里后就装车运出娘子关外去销售。

广懋公司为了扩充营业，获取较多的利润，首先在老君庙东面赁到小阳泉农民的土地五十多亩开辟为广懋厂，并在其中建筑起房院一所，其目的就是准备那里从石圪塆通广懋厂的那条轻便铁路修起后把煤炭直接装运到市内装车运往娘子关外销售，以获取更多的利润。

但是这条轻便铁路如果修成，隆丰沟一带几十个农村的脚户的牲口就要闲起来，他们的生活问题就无法解决。这些人遂联合起来，男女老少都一起出动，有的喊口号，有的号哭，有的拆铁路（铁轨），有的卧路基，甚至有的还抬着棺材去抗路，誓死抗路到底，不达到目的决不罢休。经过几个月的斗争，广懋公司因抗不过农民、脚户的反抗，遂中止继

续修路，它除损失了二十万元外，一无所获。

在阳泉三家煤炭公司中资金多，规模大，产量高的除保晋公司外，就数广懋。

、建昌公司

这家公司是民国元年成立的。它是由当时的陕西督军陆建章发起并积极筹办的。据其内部人说它的资金为一百二十万元。

最初的总办是陆建章的儿子陆绍文，后来陆绍文将总办转让给王药生。王药生名达，曾当过袁世凯的承启官，办有坨清高线，周长高线铁路公司，大业银行，还办着京东十县盐务。王药生因事务忙，无法兼顾建昌的事，遂让他的胞弟王荫生（名孙逊）代他驻矿主持建昌的事，人们称他为“二总办”。民国十七年因张作霖率兵入关，占据北京，把王药生办的两条高线路和京东十县的盐务都抢走，同时大业银行也倒闭，因靠山失掉，无法周转，连工人的工资也发不出来，遂转让给天津福祥昌公司，由金炳南主办，一直至一九三七年秋，阳泉沦陷后，建昌才宣告停办。

建昌只在燕子沟有一个矿，两个坑口，一是步筒，一是井筒。井筒用水泵从坑下往上吸水，步筒则铺设铁轨往上运煤，半机械化，日产八百吨。有职工三百人。

公司内设有总办、矿师、总务、营业、会计，分别办理公司里的一切有关事项。

建昌公司在阳泉的三家煤炭公司中是规模较小，产量较低，资金较少的一个煤炭公司，但道岔却一直铺到其煤场下，所以运输比较方便。

总之，三家煤炭公司共同的特点是以追求利润为目的，

而对工人的待遇、安全和困难都是置之不理的，这与解放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煤炭事业在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

除上述特点外，还有一个特点是公司的盈余都是寥寥无几，有的甚至欠外债，但公司里的人员有的却发家致富，入股开煤窑，投资盖房子或娶姨太太，过着花天酒地的腐朽生活。如保晋公司的总稽核王骧投资在阳泉开办平记煤矿，保晋公司总务张学粹在阳泉盖房子，并向大兴矿入股。又如聂冠英是广懋公司的一个营业员竟娶下年轻的小老婆，同时在其原籍买地盖房，人称为是“新发户”。

（选自《阳泉史志通讯》略有删改）



山西争矿运动始末

姚富祥

一八四〇年，英国侵略者发动鸦片战争，用坚船利炮撞开了中国闭关自守的大门。紧接着，各资本主义国家蜂拥而来，疯狂进行对华侵略。随着入侵者往来船只的日趋增加，作为燃料的煤炭就成了他们首先争夺的对象。

外人觊觎山西矿权 清廷政府拱手相送

山西煤炭之富，早已闻名于世。清同治九年（一八七〇年）和十一年（一八七二年），德国地理学家兼旅行家李希霍芬曾两度来到山西。他在勘察了山西的煤炭资源以后，著书说：“丹那教授比较各国煤田与土地总面积的比例说，宾夕法尼亚州是世界第一，该州总面积为 43960 平方哩。中国的山西省总面积为 55000 平方哩，若仔细考察的话，则它很有可能夺取宾夕法尼亚州的荣誉，因为后者的煤田比例大大地超过了前者。但这不是中国方面煤田的唯一的优点，还有一个优点是开采便利，成本低廉，因而可以大量开采。该省有几处煤矿所出产的无烟煤，其品质明显地堪与宾夕法尼亚州的上等煤媲美，而每吨仅售一先令，所有煤块都达几立方呎”（肯德著《中国铁路发展史》118页）。

李希霍芬来华勘探期间，曾在上海发表了《中国旅行报

告书》。这个报告书的发表，就象扔出一块肥肉，立刻引来了争相啖食的饿狼，外国资本主义开始用贪婪的目光，紧盯着山西丰厚的煤炭资源。清同治十二年（一八七三年），英国国会为掠夺山西煤炭进行了一场辩论。国会议员阿克莱德质问外交部次长恩斐尔侯，问他是否注意到李希霍芬的报告书，叙述中国若干省分，尤其是山西省有丰富的煤炭资源；又问他英国政府是否打算和一同签订《天津条约》的诸盟国共同协力与清政府交涉缔结附约，以便使英国及欧洲资本能在中国进行矿业的投资，以及与此相关连的铁路修建事业，并得到条约的适当保障。外交部次长恩斐尔侯回答说，李希霍芬关于中国山西诸省的报告，已由英国驻上海领事于一八七〇年九月送到本部。他们没有理由可以怀疑李希霍芬关于这些省分煤藏量的估计的正确性，英国驻华各口岸的领事们的报告也证实了李氏之说为可靠，至于从清政府获准采矿筑路的问题，英国驻华公使阿利国早在一八六九年就一再提出要求，但未能如愿。

显而易见，山西煤炭已日益被外国资本主义所注目，并且成了他们重点掠夺的目标。

甲午战争以后，帝国主义看穿了清政府软弱无能的本质，于是相率攫取中国领土，掠夺中国富源。一八九七年底，德国借口山东曹州两个德国传教师被杀，派遣海军占领胶州湾，用炮口强迫清政府签订了《胶州条约》，获取了胶济铁路建筑权和铁路两旁三十里范围内的矿产开采权。曹州事件是帝国主义用武力瓜分中国的信号。继而，沙俄、法国、美国和日本等国纷纷强租中国领土，形成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各帝国主义在其势力范围之内，取得了许多政治、经济特权，开采矿业就是其中主要的一项。山西煤矿开采权的

失落，就是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

中日甲午战争结束不久，光绪二十二年（一八九六年），一位名叫康门斗多·恩其罗·罗沙第的意大利绅士，以考察中日战后情形为名，来到北京，寓居于意大利公使馆。

罗沙第经过一段时间的详细调查，初步酝酿了一个掠夺山西煤炭的计划。之后，他返回欧洲，在英国伦敦组织了一个英意联合公司，资金两万磅，按照英国法律注册，命名为“福公司”。经过一番紧锣密鼓的策划，罗沙第腰缠万贯，再赴中国。

罗沙第的福公司一开始就热衷于获得山西煤矿开采权。为了实现这个企图，他首先与中国官场交欢。他结识了一个名叫马建忠的官僚，在其手下获得一个差事，成为其私人能干的副手。马建忠精通英语和法语，并且做过中国驻英国公使馆的参赞，有相当的地位，能出入于中国政界，是罗沙第打入中国官场的理想跳板。

以后，罗沙第又结识了买办官僚刘鹗和另一个名叫方孝杰的人，一同来到山西，伺机进行活动。来到山西，他们又拉拢了山西商务局总办贾景仁。由此，他们同流合污，进行着出卖山西矿权的罪恶勾当。

刘鹗一伙为了防备人民反对，就玩弄挂羊头卖狗肉的花招，一方面组织买空卖空的“晋丰公司”，以商人名义向山西商务局请求开办山西煤铁等矿；一方面又以商人关系，用“晋丰公司”的名义向福公司借款银一千万两，与其“共同”开采山西盂县、平定州、泽州和潞安府所属矿产。光绪二十三年（一八九七年），刘鹗一伙通过山西商务局得到巡抚胡聘之的同意，与福公司签订了“请办晋省矿务借款合同”五条和“请办晋省矿务章程”二十条。

这两个条款卵成之后，因为严守秘密，没有公开，所以世人对内幕并不十分清楚。但当时一些上层官僚、绅士很快就发现了胡聘之、刘鹗一伙出卖矿权的劣迹，于是纷纷奏本，强烈反对。慑于舆论压力，清朝政府下令罢黜刘鹗一伙，“晋丰公司”也随之夭折。

清朝政府本无意开办实业，于是在罢黜刘鹗等人的同时，把出卖山西矿权的交涉事务交由总理衙门直接办理。总理衙门调山西商务局代表曹中裕火速进京，在总理衙门与福公司代表罗沙第进行谈判。

谈判期间，英国公使对总理衙门施加压力，进行威胁。经过谈判，将“晋丰公司”所订合同加以修订，拟出“山西开矿制铁以及转运各色矿产章程”二十条。五月二十一日，山西商务局代表曹中裕和福公司代表罗沙第在总理衙门正式画押。这样，腐败颀颀的清政府通过区区一纸出卖了山西矿权。

清政府直接插手修订的这个章程，要旨是福公司以向山西商务局提供借款一千万元为条件，获得了山西的矿产开采权与铁路建筑权。开采的范围是平定州、盂县、潞安府、泽州和平阳府所属煤铁，以及他处煤油各矿。限期为六十年。根据这个章程，出卖的范围比刘鹗等人的更加扩大了，开采区域原来只有四处，现在又加上了平阳府和“他处煤油各矿”。税利的分配办法是：“每年所有出矿，按照出井价值，抽取百分之五，作为落地税，报效中国国家，所余净利提百分之二十五归中国国家，其余的归福公司”。很明显，余利的绝大部分被福公司攫取。这次索性不用与“晋丰公司”合办的名义，而是由商务局直接“转请福公司办理”了。这个章程还明白规定：“凡调度矿务与开采工程，用人、理财吾